

卓新平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宗教起源纵横谈



宗教起源纵横谈

卓新平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宗教起源纵横谈

卓新平 著

责任编辑：许久文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56,000 印数：1——3,376

ISBN7—217—00575—2

B·55 定价：2.50 元

湘人：88—17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	1
第二章	哲学史上的思辨	9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时代对宗教起源的解说	9
第二节	基督教中世纪对宗教起源的神学解释	22
第三节	近代哲学中的宗教起源论	29
第三章	人类学的崛起	47
第一节	古代人类学萌芽状态中对宗教之源的猜测	48
第二节	“地理大发现”以来对“人”的研究和对“宗教”的关注	57
第三节	社会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对原始宗教的研究	68
第四节	当代人类学理论与宗教现象学研究	76
第四章	宗教起源心理说	92
第一节	缪勒与自然神话学派	93
第二节	泰勒与“万物有灵论”	109
第三节	弗雷泽论“法术”	126
第四节	奥托论“神圣”	139

第五节	冯特的“民族心理学”	149
第六节	施密特与原始一神论	156
第七节	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	166
第五章	宗教起源社会说	17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论宗教起源	184
第二节	法国社会学派及影响	194
第三节	杜尔凯姆论“宗教生活”	208
第四节	列维·布留尔论“原始思维”	226

第一章

序 论

关于宗教的起源，有着各种理论和假说。人类在其理性的发展中，总不忘对那远古之梦的追寻，想从中窥探人类智慧之谜。这种回溯和探索，或体现为对“灵智”的思辨，或流露为对“心境”的惊叹，或是对群体凝聚力的探测，或是对梦幻创造性的捕捉。各种追溯和探寻，又往往溶合在对宗教这种人类既熟悉而又神秘之现象的追忆和沉思之中。神仙之飘逸、鬼怪之狰狞、命运之严酷、人生之不测——这些主客体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和意境，既表现出人类对自然和自我的敬畏，又反映了人类在求知探索中的执著精神和丰富想象。虽然，由于时代的久远和史料实物的奇缺，这种种探测只能是一些大概的推论、甚或为错误的臆断，但它们却为一种试图描绘、勾勒人类文明鸿蒙之中思维之源、文化之魂的努力，从而能获得升华的意义。

在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对于宗教的探讨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西方宗教传统的悠久和现实社会生活中宗教影响的巨大。宗教崇拜神灵，但归根结蒂却是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探究，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询问，是对人

类群体性、社会性的一种理解和把握。追寻宗教之源，正说明人类要设法弄清自己究竟是怎样发展而来，其文明之光究竟是怎样开始闪烁的。

远古的先贤和哲人，曾以奇特的想象和形象的比喻来开始这种寻根溯源的探讨。古希腊罗马诸神的鲜明个性、特尔斐神庙中“认识你自己”的至理名言，揭示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表明了人要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由来的愿望。这种对人事奥秘的好奇发展为对真理、智慧之爱。而朦胧蛮荒中那扑朔迷离之状，又使人感到其理智的有限和茫然。认识到自我局限的人们只好将自然的奇迹归之于开天辟地的鬼斧神工，赞叹造物主的伟大英明。这种致知取向，导致了西方哲学思辨中“人学”变成了“神学”。宗教的起源也被解释为来自《创世纪》那史诗般记载中的太初之道和神圣的天赋，人在其宗教中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也决定了自我的沉沦或升华。然而，对神灵的敬畏毕竟潜含着对自我的呼唤，人的个性并不在对神的顶礼膜拜中消融、折服，而恰恰是经受了锤锻、磨炼。中世纪《神曲》中的人间之音，终于化为文艺复兴中的巨人精神。“人文主义”、“人道精神”、“天赋人权”，这些响亮的口号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泽。于是，对宗教的探求也从“神本”转为“人本”。哲学上的人本主义为宗教起源的理论谱写了崭新的篇章。

宗教中视人为“万物之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对“人性”的认识。宗教使人屈服于神灵天命，却又鼓励人成为万物之首和自然的主人，视人为“万物的尺度”。错综复杂的“人性”命运驱使人去了解“人究竟是什么”，从而导致了对人“类”

的界说和区分。古代这种对人的“特性”和人的“类别”上的剖析与理解，实为“人类学”之滥觞。人对自己“类”的界说曾经多种多样，但都想藉此与动物划出清晰的界限。例如，人曾根据其语言、思维，其社会群体性和其宗教信仰等来确定自己“类”的特征。这种探讨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深化、人类视野的不断开阔，便逐渐形成了从生物学上对人类生理、形体特性的研究，从社会学上对人类组织、政治范型的界说，从文化学上对人类民族、风俗种类的探讨，以及从历史发展、心理气质、哲学思辨和宗教信仰等层次上对人类的剖析。尤其是近代史上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人打破了其地域和视野上的局限，对“人类”有了更广更深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在开始时尚带有种族的偏见，却刺激了人们对过去的回首、对现今的沉思和对未来的展望。从此，实地调查、民族志学、人种分类便成为学术讨论的热门课题。而广义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又使人们能从一种新的角度来探讨、分析人类宗教之源。这种由强调综合、整体的近代人类学所提供的契机，自然便迎来了宗教起源学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的局面，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美不胜收。

社会人类学对宗教之源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西方从事原始宗教研究的理论基础，影响到今日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这种宏观统一的人类学研究在微观发展上获得了两种方位上的深化，即从心理上对宗教起源的分析、以及从社会上对宗教起源的推断。人们从心理情感和社会意识上对宗教的把握，使人类学与哲学和社会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哲学意义上，它导致了哲学人类学的全新发展；而从社会学意义上，则引起人们对政治学、经济学的强调。这样，古老的命题获得了青春的活力，悠远的乐章被卷入现代交响曲的旋律。对宗教起源的研究从而既有着历史的深度，也反映出极大的现实意义。

洞观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宗教起源的诸种理论，我们能够深刻体会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复杂。人类文化中的这种“灵性之光”，有着独到的魅力和意境。它一方面驱使我们去钩深致远、探赜索隐，另一方面则启迪我们来温故知新、别获情趣。而对西方宗教起源种种说法的反思和剖析，正是为了能从人类文化整体这一高度来重新认识宗教现象，对之加以恰当的把握和度量，作出正确的评价。

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况，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区别。诚然，宗教的存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并没有获得象在西方社会那样至高无上、深入人心的地位。西方这种“万流归宗”的宗教一统与中国“三教九流”的多元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原始宗教和巫祝形式多被视为迷信，而“儒、释、道”三教始终都须依附于封建“皇权”才能获得其生存和发展。一般而言，中国人的宗教情感要比西方人淡薄，知识阶层也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怀疑态度。甚至在许多人眼中，宗教只等于“迷信”和“落后”。为了强调中华文化的优杰，有些学者曾经断言华夏乃“无宗教”的国度。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1873—1929）就曾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一文中自豪地声称：“吾国有特异

于他国者一事，曰无宗教是也”。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本无宗教，现存宗教乃外传而至，在中国并无深厚的基础。他视哲学要远远高于宗教，但也承认在西方实际生活中宗教却凌驾于哲学之上。与之相反，他觉得华夏文化重哲学而轻宗教，因为哲学贵疑，宗教贵信。而信有正信，也有迷信。他不喜欢宗教，认为“其偏于迷信而为真理障也”（《饮冰室文集》）。所以，他视中国无宗教乃是一种幸运，并认为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毫无必要。这种观点也被梁漱溟等人所接受。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梁漱溟指出中国人乃是世界上唯一对宗教兴趣不大的民族，即所谓一种“非宗教的民族”。正是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不少学者坚决反对把儒家等同于宗教，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曾有“儒教”的出现和存在。不难看出，从这一层次上对宗教的理解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现今对宗教的研究。

由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不同，西方有关宗教起源的理论不能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但是，也应看到，宗教作为一种伴随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现象，自然有着一定的共性。宗教在中国不少地区、不少民族中的深远影响和悠久历史，也是客观事实。因此，在探讨、研究宗教之源时，中西实际的比较、衡量，各自理论的借鉴、对照，却是很有必要的。在宗教研究中，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我们也曾有过偏颇和失误。况且，因长期闭关自守的缘故，我们对西方学者近、现代以来在社会人类学等方面对原始宗教的考察和探索也知之甚微。这种缺陷，势必影响我们对人类文化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基于这种思考，我们本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精神，对西方有关宗教起

源的各种理论加以描述和剖析，以便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研究宗教起源，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是对原始宗教的探讨。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和广度，导致了西方学术见解上的众说纷纭、不相一致的局面。不少假说和推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许多见解和观点也在实践中得以修正和完善。所以说，这种研究有着双重的意义。它既是对原始思维 and 文化的钻研，也是对近现代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展现。远古之景借助于近代智慧而得以再现，其真伪之分、是否之辨，必然会启发我们对“历史”意义的多层次理解，看到其文化笔触的多姿多彩。当然，理论探讨上的真理、谬误，科学方法上的是是非非，也会使我们感触到现代学术讨论的不凡气氛，醒悟到找寻真理之途的崎岖不平。人类思维发展的弯曲长流，能使人感到其“任重而道远，”并体验出这种文化探源之中所蕴含的历史和现实意境。

对于西方有关宗教之源的众多理论，本文想从四个层次上来加以概述：

其一，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关于宗教起源的种种思辨。从流传千古的荷马史诗，可以找到那用神话语言表露的灵魂观念，触及宗教中对“灵魂不死”的理解之源。克塞诺芬尼的《讽刺诗》则确定了神人同形同性论的雏形。柏拉图曾展开想象的翅膀来捕捉灵魂的行踪。卢克莱修则提出了“恐惧创造宗教”的著名格言。自奥古斯丁对灵魂性质加以解说以来，西方对宗教之源的研讨便染上了基督教神学的色彩。直到近代启蒙运动，才标志着“人类成熟时代”的开始。法国战斗无神论在更

高层次上指出宗教源于“恐惧和无知”。思辨哲学大师黑格尔则从“民族精神”和“精神现象”上对宗教之势加以勾勒。而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又从“依赖感”上分析出宗教之源和其本质。这些闪光的思想和新奇的见解，达到了当时哲学思辨对宗教探源的一定高度。

其二，西方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与研究原始宗教直接有关。这里，对宗教起源的探讨不再纯为理论的思辨，而是基于对原始部落的调查研究，体现为对原始生活本质的把握和描述。人类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乃是近代的产物，人们常称其为“启蒙运动之子”。但人类学思想的萌芽却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曾有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约公元前480—前429）对古代历史和各族风貌的描述。这位“殖民地的希腊人”不仅曾留居雅典，而且还游历过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甚至黑海以北的斯堪特地区，写下了各处的民族习俗、风土人情。因此，他既被西塞罗称为西方“历史学之父”，同时也被尊为“民族志学之父”。此外，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述中也记载有大量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史料。十五世纪末叶哥伦布等人对美洲的“发现”，激起了西方探讨当地“土著居民”的兴趣。两种不同层次文化的接触，促进了近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的逐步形成。而这种以研究原始社会、原始宗教为主的社会人类学更是与西方近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社会人类学发展成熟的标志，便是各种原始宗教理论的问世。宗教之源的探求，从而成为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其三，在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宗教之源的探讨深化到

对人类心理的分析，形成庞大的宗教起源心理学说。这种侧重心理的界说，可以包括以西方宗教学之父缪勒为代表的自然神话学说，《原始文化》作者泰勒的“万物有灵”假设，人类学家弗雷泽对“前宗教”时期“法术”的推测，宗教哲学家奥托对“神圣”观念的剖析，心理学家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理论，以天主教神甫施密特为代表的维也纳民族学学派的“原始一神”论断，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图腾与禁忌”之源的心理分析等。这种心理学说使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宗教神学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宗教起源“破译图”。

其四，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了宗教起源社会学说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从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对宗教的起源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学理论。而对当时人类学上的研究成果，他们也虚怀若谷，加以潜心钻研，给以适当评价。十八世纪以来，被视为社会学故乡的法国也产生出不少研究宗教起源问题的著名学者。闻名遐迩的《社会学年鉴》不断推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杜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则成为研究原始社会和宗教的必读经典。社会学意义上的宗教研究，为不同学派和主义的理论提供了令人深思的“切线”和“交点”。

鉴于水平和篇幅，本文只对这四个层面上的宗教探源加以粗略的论述，希望能为读者了解西方关于宗教起源的种种理论提供一幅概观性透视图景。至于对各个具体问题的深化性探讨，则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努力。

第二章

哲学史上的思辨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时代对宗教起源的解说

西方哲学的发展，可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代。在古代希腊人那里，开始了西方历史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其标志，一为其神话所体现的人文宗教特质，二为其哲学思想的萌芽发展。从神话想象到哲学理性的过渡，代表着人类认识能力上质的提高。虽然，希腊人的世界观尚为一种朴素、笼统的认识，人与自然尚被当作一个直观性整体来把握，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开始探讨万物的本原和世界的规律等哲学基本问题，从而吹响了其理性探索的进军号令。

这种从神话到哲学的过渡，体现在公元前九世纪希腊史诗之父荷马（Homer）所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以及公元前八世纪希腊教诲诗之父赫西俄德（Hesiod）的《诸神谱系》之中。这些著述，记载了丰富的希腊神话传说，叙述了自宇宙初始以来希腊各种神灵及英雄们的来源和谱系，成为研究古代希腊宗教观念的百科全书。在各种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神人同形同性，多有生死，而对于宗教之源的探求，尚处于无

自我意识的摸索阶段。但这种寻源探究，我们已经能够从对希腊诸神谱系的排列和对死与灵魂关系的解释中间接推测出来。

古希腊人思想观念中对人与自然的不加区分，反映在其宗教神话中便是神人之间的渊源关系和密切联系。这里，统治宇宙的大神与整个自然世界溶为一体，人类的部落和王国也与诸神有着种种血缘关系。人、自然、神灵的三位一体，便出现了半人半神、半人半兽和半神半怪的生动形象。这种荒唐怪诞的形象即反映出人们寻求综合、归纳的一种努力。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在形成抽象思想，但因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形象直观性，使他们多用具体的东西、生动的形象来表示其抽象观念。为此，黑格尔曾经指出，希腊神话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形象化的想象”，^①这种“形象思维”尚未达到“抽象思维”的高度，所以还不属于哲学的范畴。

在神话传说中，人们寻找着世界和人类的核心所在，企图弄清世界的秩序、理出发展的线索。同样，在希腊神话错综复杂的众多神灵中，也体现出以奥林匹斯诸神为中心的神灵谱系。它与人类王国紧紧相连，从而构成一幅统摄万物的整体宏图。在这一神谱中，天神宙斯（Zeus）位于中央。但他并非空前绝后的超越神君，而有着丰富复杂的谱系联络。古希腊人正是用找寻宙斯来龙去脉的生动形式，表达他们对世界之源和其民族之源的探求。宗教、世界、人类三者同源，这在他们的神话表述中是不言而喻的。其朦胧的历史观正表现为这一幕神灵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1956年，第84页。

主宰、人、神同演的壮烈史诗。简单而言，宙斯神谱若往前回溯，可追至鸿蒙之初的苍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母神盖娅（Gaia）。他们所生的奥克亚诺斯（Okeanos）、赫普伦（Hyperion）、泰风（Typhon）、亚彼托斯（Japetos）、门尼莫西内（Mnemosyne）、克洛诺斯（Kronos）和莉娅（Rheia）等六男六女构成提坦诸神，由幼子克洛诺斯担任提坦神王。克洛诺斯与莉娅所生的赫斯提（Hestia）、波赛东（Poseidon）、哈得斯（Hades）、得墨忒耳（Demeter）、宙斯（Zeus）和赫拉（Hera）等子女构成奥林匹斯诸神，由幼子宙斯担任奥林匹斯神王。他率领众神推翻父王，成为最高神君。若往后伸延，从宙斯处则派生出海尔梅斯（Hermes）、阿耳忒弥斯（Artemis）、阿波罗（Apollon）、亚力司（Ares）、雅典娜（Athena）、赫柏（Hebe）、赫斐斯塔司（Hephaistos）、狄奥尼索斯（Dionysos）和阿芙若狄蒂（Aphrodite）等希腊主神。

从宏观整体来看，古希腊神谱把天上、人间，太初、现今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和希腊各古代民族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若把上述神谱加以扩大、展开，我们则会看到更为壮观、复杂的透视图景。希腊神谱的开端，表现了典型而普遍的古代宇宙生成论思想：太初天地不分，浑沌如一（Chaos）；从这种浑沌之状中首先形成大地（母神盖娅 Gaia），然后出现宇宙之基、位于地狱之下的冥间塌塌如斯（Tartarus，一译它塌罗斯，Tartaros）。盖娅为宇宙之母，使其形成苍天（父神乌拉诺斯 Uranus）、大海（海神蓬托斯 Pontos）和山脉（Gebirge）。一说盖娅与其弟塌塌如斯结合，生下怪神泰风（Typhon）。盖娅

与乌拉诺斯结合，生下提坦诸神。乌拉诺斯因嫉妒其子而被幼子克洛诺斯（农神）阉割，丢掉王位，从其血泊中产生复仇三女神（Erinyen）。提坦神王克洛诺斯与女神莉娅结合，生下奥林匹斯诸神。当他得知子女中将有欲夺王位者，遂将子女一一吞下，但幼子宙斯被莉娅救出。宙斯最后救出众兄弟，推翻父王，将提坦众神幽禁于塌塌如斯，奥林匹斯诸神于是成为希腊神话中的核心神灵。以天神宙斯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神谱与希腊古代各族的关系：宙斯与墨提斯（Metis）之女雅典娜（Athena）为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宙斯与狄奥妮（Dione）之女阿芙若狄蒂风流于神人之中，她与战神亚力司之女哈莫妮娅（Harmonia）嫁给了提诺王子卡德莫斯（Kadmos），她与凡人安奇瑟斯（Anchses）之子埃涅阿斯（Aeneas）则成为特洛伊王的女婿；而宙斯与提诺国王之女欧罗巴（Europa）的结合，其后代则构成克里特王室族系。这种对神谱的描写及神人之间的挂钩，说明古希腊人“开始在心中形成一种信念，相信事件表面的杂乱无章必定隐藏着内部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又是非人格力量的产物”。^①正是在这种寻找秩序的努力中，人们已经萌生出最初的哲学观念。古希腊人对神谱的追溯、整理，说明他们既在探求宗教神话之源，也在追寻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本原。

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了“灵魂”的概念。“独立灵魂”普塞克（Psyche，一译“赛奇”，为有蝶翼的少女形象）和“呼

① 参见W.R.C.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第26页。